

传媒 论典

丁隆林
柯惠新
李良荣
黄勇
陈力丹
涂光晋
解国记
何丹
黄升民
黄旦
江涌
潘忠党
王克勤
赵月枝
.....

与传媒名家对话

演绎传媒经典理念
透视传媒运作精神

王永亮 成思行 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CTP CENTRAL COMPIR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主编简介:

王永亮: 1970年6月生于山东临沂, 教学两年, 办报八年, 曾荣获国家、省级新闻作品奖。1995年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 现在攻读新闻学博士学位。截至2003年8月, 发表新闻学论文50多篇。

E-mail: wang716@hotmail.com

成思行: 传媒研究者, “中国传播学者访谈”总策划。

E-mail: csxh@163.net

传媒论典

与传媒名家对话

主 编 王永亮 成思行

副 主 编 李晓静 张春丽

特约统筹 柯 杨

 中央编译出版社
CCTP CENTRAL COMPIR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媒论典:与传媒名家对话/王永亮,成思行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

ISBN 7-80109-729-7

I. 传…

II. ①王… ②成…

III. 新闻工作者-访问记-中国

IV. 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8767 号

传媒论典

王永亮 成思行 主编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521152,66521270(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h t t p://www.cctpbook.com

E m a i l:edit@cctp.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保定市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270 千字

印 张:22.375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1.80 元

前 言

有没有这样一本书：它集纳海内外知名学者，发表富有建设性的精辟见解，瞄准世界学术前沿，注重理论贡献，融会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良性互动，旨在提升新闻传播学研究跃向新境界？

有没有这样一本书：它包容海内外知名记者，忧国恤民，秉笔直书，倾注人文思想于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贯通、联袂学界和业界的时空舞台，奉献出一幕幕理论、实践水乳交融的活剧？

有！展现在您眼前的《传媒论典》就是这样一本书。

本书31位访谈人物中，从层次上，包括了71岁的丁淦林、52岁的陈力丹、38岁的赵月枝等老中青三代人，全面展示了新闻与传播学界最强大的阵容，其中既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又有新闻传播学界第一批博士兵团，还有两届国际中华传播学会会长；从界别上，实现了传媒业界和学界的双向兼容，学者、记者的双重角色随着时空转换，他们的经典哲言使理论和实践合璧生辉；从地域上，包容了中国内地和港台、美国、加拿大等地区和国家，他们的观点博综精思，灵构妙筑，相互映照。正可谓贯通学界业界，融会国内海外。

本书实录名家之言，荟萃经典之论，展示出他们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气象，传播给读者一种“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的心灵愉悦。相比学究式的陈述，本书恰似中国古代记史的口述体方式，具有现场感、人情味，富于启发性、原创力，三言两语的点拨消弭了理论阐述所难以避免的失之抽象的缺憾，力求使读者既开阔传媒学术的视野，又深化新闻实践的习得。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让我们开卷得益，捧读品味这些传媒宏论、经典妙语：

有着眼于思想文明的层面对新闻史实所作的深广开掘和纵横比较：丁淦林说，研究《新华日报》，就是要研究我们在别人执政的地方，如何合别人之法，如何成功经营、开办合法报纸。如果我们把报纸办到国外，《新华日报》的经验是不是很重要呢？

有对传播学术界热门问题的独到见地：潘忠党说，中国传播学进一步的发

展,其核心在于走出“学以致用”的藩篱,走进“学以启蒙”的天地,在于能够提出并解答自己独特的课题。

有契合于“经世致用”的层面对新闻实践操作所作的讲解和示范:解国记说,为党分忧的政治素质,为民请命的百姓情怀,高人一筹的新闻敏感,是做好记者工作的三要素。

有从求穷理论、致力实践的路途中升华出来的思想感悟和人生絮语:黄升民说,我一直都说自己是一个农民,就是说我在不断地工作,不断地挖掘,去培育这么一群劳动者。

……

《庄子·逍遥游》说:“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舟也无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功”;西方哲人鲁巴金说:读书是在别人思想的帮助下,建立起自己的思想。无论是深造于象牙塔的莘莘学子,抑或是初踏传媒战线的批批新锐;无论是闯荡业界几十年的“老记老编”,抑或是专事研究传媒的学界精英,有《传媒论典》相伴,当你撰写学术论文匮乏理论支点,当你采编新闻陷入知识盲点,苦思冥想不得要领之时,不妨静心研读《传媒论典》这本书,也许会“近鉴毫端,远察天际”。

本书采访者多为京、沪、穗等地名校硕士生、博士生。忝为主编,除了最早享受、放胆雕琢31位访谈人物的激情神思,有些事难以忘怀——“非典”时期外出采访,多次冒险勇闯禁区,《传媒论典》中有多位学者纵论“非典”;几家学术期刊主编发电激赏:你们在为业界做一件大好事,我们乐见其成,并将尽力推介。由于大家可以理解的原因,本书在对专家学者的排序上沿用了序齿列位的办法。显然,这种次序并不表示编者对名流们的评价。

王永亮 成思行

2003年10月18日于北京

目录

Contents



◀ 丁淦林
与历史同行

研究解放前的《新华日报》，就是要研究我们在别人执政的地方，如何成功经营、开办合法报纸。/ 1



◀ 杨继绳
挥泪书民情

说真话难免会得罪人，既然选定了当记者，就堵死了做官的路。/ 13



◀ 张骏德
布衣教授

到一个陌生的领域去开拓，看起来好像是吃亏了，但实际上最容易创新。/ 23



◀ 应天常
拷问电视文化

我厌恶媚俗，我也力求将媒介批评的过程审美。/ 33

▶ 刘京林
学术音符是真、奇、巧

不喜欢重复和平庸，常会被深邃的思想所震撼，为奇特的点子所激动。/ 45



▶ 吴廷俊
守住一个“真”字

办报需要“勇”的精神，甚至需要张季鸾所谓的“时时准备失败”的精神。/ 57



▶ 柯惠新
随术起舞

我学习跳舞的时候和学习一门知识的时候是一样的，很认真。/ 69



▶ 徐泓
小人物？大人物！

要有一颗职业心和专业心，用一种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去工作。/ 79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李良荣
大师情怀

我从心底里热爱自己的学生,我就像老母鸡一样,保护着我所有的学生。/ 91



◀秦志希
“蓄势”求突破

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功利性的,而新闻之于社会具有直接的功利性。/ 103



◀黄勇
广电总局的学者官员

我始终认为人应该保持一种正直的品格,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113



◀周乃菱
用史学眼光探寻新闻

中国如果想和世界接轨,首先就要在华人的媒体圈里树立自己的权威。/ 125

▶刘海贵
教学与科研齐飞

搞科研一定要搞前人没有涉及的东西,开辟一个新的领域。/ 137



▶陈力丹
静气养大气

媒体应该检查一下自己的报道,看有没有对生命的轻视倾向,有没有对死亡的麻木。/ 149



▶涂光晋
格超梅以上,品在竹之间

新闻报道实现了受众的知情权,新闻评论实现了媒介和受众的话语权。/ 163



▶解国记
国家大报应该这样办

世情、国情、民情把握得越透,新闻工作才会做得越好。/ 175



目录

Contents



◀邵培仁
学术呼唤良知

我主张学术的独立与自由,因为它能诱导人的创造力量和潜在力量。/ 187



◀何帆
为中国传播学把脉针灸

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的选择极为重要,往往决定研究成果的价值、研究者的成就和学术地位。/ 197



◀祝建华
大众传播研究谨防“陷阱”

学者与记者是站在帮助公众认识世界的两个极端:记者是通过重大事件,学者是通过平常小事。/ 209



◀黄升民
现在从“负零”开始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触及到许多属于体制方面的问题,那我们就顺其自然往下走。/ 221

▶张咏华
弹奏平衡交响曲

放眼未来是因为未来充满着变量,而立足当前则可以为未来夯实基础。/ 233



▶黄旦
有真意,去粉饰,勿卖弄

能在众多角度中抓住自己的立足点展开研究,就可以算是成功的传播学研究。/ 243



▶蔡铭泽
做学问要迷、疯、静

认准的事情,就要坚决地咬着牙齿做到底,就要有查资料的劲头,一坐到底。/ 255



▶展江
心忧学界自奋起

反对媒体公司论和集团工具论,抵御不良政治和经济势力对媒体的腐蚀。/ 265





◀ 潘忠党

学为问,学而知不足

学术品位以扎实为上,灵巧次之;缜密为上,宏大次之;清晰准确为上,文采修辞次之。/ 275



◀ 冯建三

不乐观,但也不耻犬儒

媒体“有能”是监督制衡政商的必要条件,也惟有如此,我们才能敦促媒体如实反映,甚至带动社会前进。/ 287



◀ 曾廷全

动网才会悟道

必须有意识地让这个网络动起来,在动的过程中悟出道理。/ 299



◀ 曹鹏

须学万人敌

敏锐来自于资料的全面占有和充分利用,灵感则来自于记者的职业天赋。/ 309

▶ 陆地

演绎传播新理念

没有民营电视企业参与的电视产业化,不是真正的产业化。/ 319



▶ 王克勤

以新闻力量推进社会文明

媒体应该以“体现人文关怀,关注制度安排”为己任。/ 327



▶ 赵月枝

批判·理性·正气

我觉得做学问要有创新的胆气,更要有承认挑战观点的气度。/ 337





丁淦林：与历史同行

研究解放前的《新华日报》，就是要研究我们在别人执政的地方，如何成功经营、开办合法报纸。

个人简介

丁淦林:1932年7月生于江西南昌。1955年7月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新闻系秘书、副主任、主任、新闻研究所所长、新闻学院院长;并任复旦大学社会科研处科研组组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学位委员会委员、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1997年被授予“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称号。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校新闻传播学院(系)的顾问或兼职教授。著作有《邹韬奋年谱》、《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图史》等。

虽然年已古稀，外表上看去和他那个年纪的人并无两样，但丁淦林老师总让我感觉到精神饱满：他目光深邃，神态慈祥，讲话有力，步履从容。不论在哪里，大家碰到他总会亲切地唤他“丁老师”，这时他就会招手示意，微笑地大声说：“你好！”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就敏锐地关注中国的新闻改革，积极探索并为新闻传播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洒下汗水。他从过去走来，经历过激情岁月，体会过动荡年代，又身处开放时期。当向他提出采访意愿时，丁老师欣然应允。

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不求闻达

王硕：我了解到您少年时代是在江西吉安就学的。吉安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中国最早的革命根据地就在那里建立。当时那种环境对您以后的发展影响如何？

丁淦林：我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习、生活经历对后来的人生道路影响很大。学校自由开放的氛围和老师们身体力行、默默耕耘的作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的校长和一些任课老师水平很高。

吉安是一个进步力量比较活跃的地方。比如在1938年，复旦大学曾迁到庐山，有很多进步大学生就来这里组织宣传活动。我上初中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校长陈启昌是一个爱国敬业的人，从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思想进步，禀性坦诚刚直，对国民党的专制腐败厉声斥骂。其实早在1937年，他就受国民党将领的委托，在吉安创办扶园中学，还聘任余家宏、贺忠等中共党员来校任教，使那里一时成为进步思想活跃的园地。为了办学，1945年春，他变卖全部家产，倾其所有创办了私立中学——至善中学，校名取自《礼记·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陈启昌提倡我们博览图书报刊，自由议论各种问题。于是在两年半的初中学习中，我很喜欢读报纸、看杂志。那时候接触比较多的是《观察》、《大公报》、《文汇报》和《文萃》。1948年8月，我到阳明中学读高中，进一步接触到各种书报，比如《群众》杂志，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范文澜、翦伯赞写的书。高二的时候，我在学校的学生会负责编墙报。因为国民党机构当时就设在学校旁边，所以我们亲眼看到他们乱抓壮丁，十分腐败。每届国民党“专员”下台离任时，大家难免在背后评论：“上任是官，下任是狗”。墙报上的文章很多揭露了国民党官员的恶行。每当他们来校查看时，校长都会站在我们一边，用别的东西把墙报遮掩起来，免得惹上是非。

王硕：看来在中学时期，您接触报刊的机会就不少，也因此您决定将来学习

新闻专业吗？

丁淦林：是的，因为初中、高中养成了看报习惯，也自己动手办过墙报和黑板报，于是对报刊兴趣浓厚，高考时，自然就想到了报考复旦新闻系。

当时学校里一些老师的行为和人品对我影响颇深。他们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性格鲜明，不求闻达，但学问过硬，功底扎实。比如刚才谈到的校长陈启昌，教我们英语课。他教学方法很到位，全用英文授课，我虽然只学了两年多时间，但打下了较扎实的英语基础，当时完全可以看懂一些英文版小说。值得一提的还有王泗原老师，讲授语文，一丝不苟。我原来对语文兴趣不是很大，记得他在改作文时，把我叫在一旁，一字一句细致地指出问题所在；还告诉我，作文就是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写在纸上。他的指点使我的语文水平日益见长，学习兴趣也越来越浓。解放后，王泗原老师被请到了北京，专门编审语文教材。他精通古典文献，曾参与《辞源》的审稿，出版了《楚辞校释》和《古语文学例释》等专著，颇受叶圣陶先生的赏识，几次催他出书，还专门为书题名。他的确是古汉语方面的专家，特别是在古音韵学方面，功底极其深厚。我想他就是那种知识分子：默默无闻、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不求闻达。这些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心系祖国，对民族文化有深厚的感情，总是想要让国家发展好。

记者本来就是一种有风险的职业

王硕：后来您顺利地考入了复旦新闻系，开始了大学阶段的学习生活。大学时期您也和现在新闻系的学生一样，听课、办校园报、到外面实习吗？

丁淦林：我是在1951年7月份参加高考的。结果我如愿以偿，进入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当时我们班上只有29人，课程包括语法修辞、哲学、国家与法权基础、俄语和世界政治经济地理，专业课有采访写作、新闻学概论、新闻史。给我们带课的不乏名师，比如当时中文系的系主任郭绍虞就教我们语法修辞课。教写作的是赵敏恒，他可是通讯社方面的元老人物，也曾是《新闻报》的总编辑。

所以学习下来，我们受益颇多。那时陈望道校长很关心新闻系的发展，要求让各系都派名师过来带课。

王硕：在大学您还继续中学时期养成的读报习惯吗？

丁淦林：是的，大学阶段仍继续这个习惯。每个星期我都会抽出半天时间，到学校的报刊阅览室看各种报刊，还进行比较。英文和俄文报刊也会看一些。这个习惯我一直在坚持。此外，我喜欢做笔记，注意积累。在报纸上看到有用的材料，我要么把全文，要么把主要内容抄在本子上，或是剪贴，网上的就下载

保存。除摘抄内容外，有感而发的感想我也写在旁边。平时如果脑子里浮现出什么问题，我就随时记下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什么知识一时想不起来或是没搞清楚，我会马上动手查证，直到了解得一清二楚才安心。因此很多历史事件我都记得比较清楚，一般不会出差错。我不相信记忆，相信勤奋。我的习惯就是有什么与自己研究相关的东西，立刻记录在案；能马上解决的问题就马上解决。

和现在新闻系的学生一样，我们本科时候也去实习。1954年，我在《安徽日报》做实习记者，报道一届人大的情况，实习了一个多月。那时候我们同学都很很有做记者的精神，愿意承受辛劳，不在意吃苦。记得我在淮南煤矿实习时，正好淮河发大水，我上堤采访，住在农村。一天半夜，大水冲来，我赶紧起床往外逃。我有一个同学在江苏实习，屋子倒塌了，他半身被塌陷的房顶压在下面。返校后，大家聊天，讲起这些经历，都觉得新闻工作就是这样的，很正常，因为记者本来就是一种有风险的职业。

王硕：1955年大学毕业后，您留校工作了，当时就是很坚定地要教书育人吗？

丁淦林：我在复旦有几十年了，户口也一直在这里，尽管中间的确有很多机会可以到别处发展，走上另一条道路，但我都放弃了，依然留在这里教书。我想这种选择与我上面所讲的青少年时期所受的影响有关。我觉得自己适合教书，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对的，我就会坚持不懈。

王硕：同学中流行一种说法，说“学在复旦，玩在复旦”。您和复旦朝夕相处，对复旦的印象如何呢？

丁淦林：我觉得复旦文化内涵丰富，各种学科汇集，中外沟通交流多，环境宽松。我上大学时，复旦的老师还不多，全校学生大概也只有2000人左右，所以基本上许多老师同学我都能认识（开心的笑）。复旦的知识结构比较丰富，那时有文、理、法、商、农五个学院，经常举办一些报告会。学生课余还可以参加各种学校工作，锻炼自己。我在复旦参与了很多社会工作，接待过外宾，参加过外国在上海举办展览会的工作，写过展览会的说明和发言稿。我还在校学生会宣传阵地编委会工作，负责出学校的墙报和黑板报。这些都增加了我的社会阅历，结识了很多，文化方面也提高不少。

必须建立我国自己的新闻学体系

王硕：您留校工作后不久，就开始了“反右派斗争”、“大跃进”，接着还有“文

化大革命”,您是怎样度过这一动荡时期的?

丁淦林:1955年毕业时,我被分配到了新闻系的中外新闻事业研究室,算上我,当时共有5个人。主任是从英国回来的曹亨闻,还有宁树藩、新华社来的刘同舜和圣约翰大学来的伍必熙,大家关系融洽,工作很开心。但“文革”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留在学校作研究的时间很少。除了军队,其他地方的生活我都体会过。1958年我带领学生在上海第五钢铁厂参加劳动,炉前炼钢。在那里负责主持创办了《合金钢》报(最初名字叫《五钢报》)。每年暑假也不得闲,都有社会工作。1958、1959和1960年,我连续几年在上海市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曾首次主编上海市高校《招生通讯》,受到了好评和肯定,这是中国第一家公开出版的铅印招生报纸。1961年,我曾到南京《新华日报》半年。1964年到1966年,我先后在上海市奉贤县、上海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做秘书工作,兼任复旦大学青年教师劳动实习队领队。

王硕:看来您当时在各种事情里忙来忙去。是不是整个国家也因为建国不久,忙于各项除旧布新的实务,所以新闻学的研究在那段时间里没什么进展和创新?

丁淦林:50年代初期,新闻学研究相对滞后,中期曾一度“学苏联”。1956年10月到1957年6月份期间,我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进修,目的是听苏联专家讲课,学习苏联经验。人大当时的系主任是安岗,他与我们系的王中联系,希望能派一个懂俄语的老师过去,以便与苏联专家联络。我大学时俄语学得不错,于是就有了这个进修机会。当时有两个苏联专家来讲课,一个是中共中央党校请来的乌克兰基辅大学新闻系的主任,一个是人民大学请来的列宁格勒大学新闻教研室的主任,都是副博士,听课的人大概有10多个,讲课的内容是“新闻理论与实践”。课上得很沉闷。我们很快就发现,苏联的大纲和教材并不科学,机械地搬用马列辞句和苏共决议,再加上若干事例,内容贫乏,索然无味,脱离实际,十分教条。而且只能老师讲,下面听课的“学生”却不能提问,其实那些“学生”的新闻业务实践经验都很丰富。那次学习使我对苏联报纸历史的沿革以及俄国报刊史有了了解,也让我认识到了教条主义教学的弊端,因为这种教学没有理论分析,武断得很,根本就是“闭起眼睛说教,板起脸孔训人”。因此,不能不加分析地照搬国外东西,而必须建立我国自己的新闻学体系。

王硕:那次人大进修还有其他什么收获吗?

丁淦林:那段时间,我想办法进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资料室,看到了很多珍贵的报刊资料,没有公开发行的党报内部资料,如《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旗日报》等,使我对苏区和地下党的报刊有了真实了解。有一两个月的

时间里，我天天去那里看报纸，这为我日后研究打下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我在中央政策研究室附近的中央保育院里访问到了恽代英的夫人沈葆英。我对她印象深刻。她穿的是泛旧的军装，住房不大，一张行军床，生活非常朴素。从她那里，我还了解到了恽代英同《中国青年》的关系。

还有一次是和安岗聊天，我感触很深。当时我们聊起俄国报刊史，我觉得俄国报刊史甚为无趣，但安岗却有另外的看法。他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那么几个知道俄国报刊史有什么关系？”这句话对我很有启发，对我后来的教学研究思想也有帮助。因为有些事情确实需要有人去了解的，即使不必需要很多人。试想，如果在某些文化学术方面，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一个人去钻研，那么我们的学术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连中国自己的历史问题，也要到美国去找专家解决，那就有学术上变为殖民地的危险，历史要失传，文化和文明的传承要断代，这会让人感到非常悲哀。

编教材也是不断进行研究的過程

王硕：我记得本科时我们用的教材就是您主编的，到现在，您大概编过多少本教材？

丁淦林：我在1995年主编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大纲》，这是国家教育部正式发布的新闻传播学方面惟一的一本大纲。此外，在2000年9月出版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新闻学专业的《中国新闻事业史》，也是我主编的。还有我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新闻事业史》在2002年8月出版。这几本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级教材。算算看，80年代以来，我参加编写的教材，公开出版的有6种以上。

王硕：除了编教材，我听说您还负责《辞海》新闻学部分的编写？

丁淦林：是的。从1958年开始，几次《辞海》的编纂修订，我都参加了新闻条目的编写工作；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我也参加了编写工作；此外，还有些新闻学字典也曾请我做过顾问。编订《辞海》是一项艰苦细致、精益求精的工作，别看一个条目只有几十个字，但这确是字字斟酌，比写几百个字困难得多啊。辛苦是辛苦，但稿费也只有不多的几十块钱，哈哈。《辞海》要求特别严格，哪怕一个字，我们都会思量再三。听说有关单位为一个“了”字进行过讨论，在“提出了问题”和“提出问题”两种写法间犹豫。后来胡乔木同志拍板，去掉“了”字，避免过多使用“了”字，没完没了。

王硕：编教材、字典都是很劳心费神的事，同时也会影响到自己写专著，您